



中国经济文库 · 应用经济学精品系列

A Study on the New Urban Poverty in China

中国城镇 新贫困问题研究

胡
永
和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经济文库·应用经济学精品系列

A Study on the New Urban Poverty in China

中国城镇 新贫困问题研究

胡
永
和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城镇新贫困问题研究/胡永和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136 - 0644 - 8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城镇 - 贫困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6 ②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8899 号

责任编辑 宋庆万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市昌平区新兴胶印厂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0644 - 8/F · 8796
定 价 42.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第一章	导 论	001
	1.1 研究的背景 / 003	
	1.2 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 / 008	
	1.3 中国城镇新贫困问题解析 / 016	
	1.4 研究的意义 / 019	
	1.5 研究方法 / 022	
	1.6 研究的技术路线及框架 / 023	
第二章	与贫困有关的概念及测量贫困的指标综述	027
	2.1 贫困概念的历史演进 / 029	
	2.2 一些主要的贫困概念 / 034	
	2.3 与贫困相关的概念 / 038	
	2.4 贫困的测量 / 042	
第三章	贫困理论文献回顾	051
	3.1 马克思主要贫困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 053	
	3.2 西方经济学关于贫困的理论 / 059	
	3.3 社会学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 / 072	
	3.4 简单的述评 / 078	

第四章	中国城镇新贫困现状及趋势	079
4.1	国内对于城镇贫困的认识 /	081
4.2	中国城镇新贫困人口的规模 /	084
4.3	中国城镇新贫困人口的构成 /	088
4.4	中国城镇新贫困演变趋势 /	091
4.5	城镇新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 /	095
4.6	城镇新贫困人口地区分布 /	100
第五章	中国城镇新贫困原因(一)	
	——转型与城镇新贫困	103
5.1	转型的涵义 /	105
5.2	转型与贫困 /	108
5.3	中国的转型及特点 /	114
5.4	中国的转型与城镇新贫困 /	121
第六章	中国城镇新贫困原因(二)	
	——城市化与城镇新贫困	135
6.1	城市化与贫困向城市的集中 /	137
6.2	中国城市化过程、趋势及问题 /	140
6.3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镇新贫困 /	150
第七章	中国城镇新贫困原因(三)	
	——经济全球化与城镇新贫困	161
7.1	经济全球化 /	163
7.2	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 /	171
7.3	全球化与中国的城镇新贫困 /	175
7.4	全球化与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及城镇新贫困 /	181

第八章	中国反城镇新贫困模式构建	185
	8.1 发达国家的贫困特征及反贫困模式 / 187	
	8.2 发展中国家的城镇贫困特征及反贫困模式 / 195	
	8.3 中国反城镇新贫困模式构建 / 201	
第九章	中国反城镇新贫困政策建议	213
	9.1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实现“有利于穷人的增长” 的根本保证 / 215	
	9.2 缩小收入差距是实现“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的基础 / 217	
	9.3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减少 失业冲击 / 221	
	9.4 大力投资教育,提高人民的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 226	
	9.5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轻意外风险的冲击 / 229	
	9.6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防止贫困向城镇集中 / 232	
	9.7 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减缓全球化冲击 / 237	
参考文献		241
后 记		257

导 论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经说过:“经济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商品的科学,而是引领人类生活的科学。”“尽管就整体而言,当代世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裕,但它还远远没有为为数众多——也许甚至是大多数——的人们提供初步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指的是人们免受饥饿、获得足够营养、得到对可治疾病的治疗、拥有适当的衣服和卫生设备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关注贫困问题是必然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城市已今非昔比:高楼拔地而起、公共设施日益改善、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迅速。然而我们清醒地看到在日益繁荣的城市里,贫困依然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1.1 研究的背景

1.1.1 研究的国内背景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上是与贫困不断斗争的历史,即使是到了21世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贫困仍然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不仅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贫困,发达国家同样也没有完全摆脱贫困的困扰。而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更是中国近百年几代人为之奋斗献身的理想。同时,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中国今天改革的最终目标。因此,贫困问题一直都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整体贫困”的状态,即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特别是农村地区,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得到保证。改革开放之后,经过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农村2.5亿之众的绝对贫困人口中有80%脱了贫。^①但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基本上一直处于徘徊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此时中国的农村贫困问题由“整体贫困”演化为一种“边缘化贫困”,即贫困主要集中在由于自然、历史、经济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原因而处于发展弱势的“老、少、边、穷”地区。针对这种“边缘化贫困”,党和政府采取的是瞄准型的区域扶贫措施,重点解决这些特殊地区的贫困问题。1994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旨在使剩下的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在2000年之前实现脱贫目标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目前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办的数据,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001年底的2927万减少到2005年底的2365万,减少了562万;低收入贫困人口从6102万减少到4067万,减少了2035万。

对于城镇贫困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城镇贫困人

^① 唐钧:《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形势分析》,《1999年社会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城镇新贫困问题研究

A Study on the New Urban Poverty in China

口通常主要指所谓的“三无”人员,即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因此,城镇贫困只是极少数人面临的问题。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贫困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在农村,政府在制定反贫困政策时也主要着眼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正如美国学者阿齐兹·卡恩(Khan, A. 1998, p42)所评论的,“中国官方的反贫困战略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贫困是一个农村地区的问题。”在学术界,对于城镇贫困问题的研究很少,大量的文献都集中在更为一般的收入分配及收入不平等问题上。

到了1990年代的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所带来的大量工人下岗及失业,引起了人们对于所谓的“城镇新贫困”的关注。这种新形式的城镇贫困与以前以“三无人员”为主的旧贫困有着根本的不同。亚行专家组在《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研究》中指出:“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相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1)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困人口要多。(2)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差距是前所未有的。(3)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具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进入21世纪后,舆论开始断言尽管中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但是,1990年代,城镇贫困人口却在不断地增加。比如,英国的《经济学家》(2001, p39)声称,“在城市中,绝对贫困正在上升……”;而《瞭望》杂志(2002年6月27日)也认为城镇贫困正在加剧。这些评论的背后是人们对于社会稳定的担心,担心城镇贫困的上升会危及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改革开放政策。正是由于这种担心,城镇贫困问题近年来引起了政府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不过,中国的城镇贫困近期才引起关注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城镇贫困问题是最近才开始出现。西蒙·阿普尔顿(Simon Appleton)等人认为,中国政府及学术界长期忽略城镇贫困问题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使用较低的贫困线,比如说1美元/天。由于中国的城乡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农村有大量的人口生活在这一贫困线之下,而在城市仅有1%的人口生活在1美元/天以下。^①

^① Simon Appleton and Lina Song(2006), "The Myth of the New Urban Poverty in China: 1988—2002", John Logan(ed.), "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 Blackwell.

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考虑到大量的农村人口仍然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而城镇居民在国家福利制度的保障之下还不存在吃饭的问题,忽视城镇贫困问题只是表明中国当时的农村贫困问题更为严重罢了。而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实施“减员增效”改革政策导致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城镇贫困问题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的一个主要诱因。这一时期对于城镇新贫困问题的讨论也仅局限在有城镇户口的城镇居民中的贫困问题。

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三峡库区考察时,熊德明向总理诉说了当地工程承包人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的事,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当天深夜,熊德明的丈夫李建明顺利拿到了被拖欠一年之久的工钱。此事经新华社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并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追薪风暴”。而正是“追薪风暴”引起了人们对于城市中另外一个群体贫困问题的关注,这个群体就是“进城农民工”。

“进城农民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长期游走在城乡之间以及各城镇之间,他们中间有一大部分人既从事农业生产,同时也在农闲时来城市务工,或者在城市中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回农村务农,找到工作时来城市打工。而另外一部分尽管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哪里有机会,他们就到哪里,在城市中没有固定的住所。而且这部分人与一般的城市居民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当在城市中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返回原来的农村老家,与农村的联系是他们生计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个群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尽管他们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在现行的户籍管理体制下,城市政府不承担对他们的社会保障义务,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说,城市政府尽量避免对这些人的社会保障承担义务。因此,不难理解这些人为什么长期被排除在城镇贫困的范畴之外。

但是,考虑到城市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农村居民向城镇的迁移不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主要渠道,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城市的扩张和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农民工进城打工正是为了满足城镇日益增长的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之所以长期游走在城乡之间以及各城市之间,不仅是他们生计策略的选择,同时也是现

中国城镇新贫困问题研究

A Study on the New Urban Poverty in China

行的对农民工歧视性制度和政策的一个结果。因此,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农村迁移人口的贫困问题将是城市政府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1.1.2 研究的国际背景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对贫困问题的关注也经历了从关注农村贫困到关注城镇贫困这样一个过程。

战后初期,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贫困问题也主要是农村人口的贫困。而对于如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农村贫困可以通过城市化以及把劳动力从低效率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转移到高效的现代工业部门中而得到解决。^① 而到 1970 年代,人们开始对于这种两部门的增长模型提出了质疑,在实施现代化政策数十年之后,经济增长的利益并没有渗漏到大量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利普顿(Lipton)提出的著名的“城市偏向”命题谴责政府偏向于城市的不公平的税收和公共开支政策不但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使城市剥夺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以及资源。^②

从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城市偏向成了一种主流的观点。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减贫战略重新从工业化和现代化回到了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的轨道上。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政策进一步纠正城市偏向,包括取消对于城市消费者的补贴以及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等。不过,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城市内部在贫困的深度和广度上有很大的变化。有些学者因此认为城市棚户区 and 贫民窟的贫困比农村地区更为严重。^③ 有关城镇贫困的数据不断被收集,再加上人们承认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必然的,并且城市人口的增长更多地是由于城市现有人口的增长而不是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这些因素最终把城镇贫困提到了发展的议程上来。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城市问题的政策报告中承认“到 1980 年代的

① Lewis, Oscar(1958), "Five Families", Random House, New York.

② Lipton, Michael(1976),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 Temple Smith, London.

③ Harpham, Trudy, Tim Lusty and Patrick Vaughan(editors)(1988), "In the Shadow of the City: Community Health and the Urban Po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and New York.

后期,有些国家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降低到了1970年的水平,而另外一些国家则甚至降低到了1960年的水平。”^①

1980年拉美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维持不变或者有所下降,而城镇贫困人口的比例有所增加。不过,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来看,城镇贫困变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拉美经济委员会的一份对于10个拉美国家的研究报告显示,1980年,这10个国家有48%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5300万),而到了1986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58%,即8000万贫困人口生活在城市。^② 非洲的数据也显示自1970年代以来,城市的实际工资有所下降,而且城市的就业以及住房情况也在恶化。城乡的收入差距大幅度缩小,而且甚至在有些国家(坦桑尼亚、乌干达以及加纳)城乡收入差距反转过来了。^③

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同时也出现了贫困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即城镇贫困人口的比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对39个国家的农村与城镇贫困人口比较研究以及对于印度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贫困人口的城市化速度要快于总体人口的城市化速度。^④ 而世界银行的估计是,在拉丁美洲和东欧,目前已有超过一半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在未来的20年时间内,这一现象也会出现在亚洲和非洲。^⑤

由此可见,城市化过程中的城镇贫困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① World Bank (1991), "Urban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Agenda for the 1990s", pp. 45—46.

② Feres, Juan Carlos and Arturo León (1990), "The magnitude of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Vol. 41, August, pp. 133—151.

③ Amis, Philip (1990), "Key themes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urbanization" in Amis, Philip and Peter Lloyd (editors), *Housing Africa's Urban Poo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pp. 1—34.

④ Martin Ravallion (2001), "On the Urbanization of Poverty", Working Paper,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orld Bank.

⑤ World Bank, "Urban Development Division, Cities in Transition: A Strategic View of Urban and Local Government Issues", 1999, www.worldbank.org/urban.

1.2 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

在讨论城镇贫困问题之前,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区别开来以及把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区别开来进行研究有没有意义。

1.2.1 对于把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区别开来的质疑

在国际上,把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区别开来进行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把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在概念上区别开来总的来说是有问题的。原因有二:第一,这种分类是非常武断的。第二,这种二元的空间分类可能会对贫困的结构性原因的讨论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会把解决贫困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到城市内部而不是整个国家。^①

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的区分之所以说是武断的,一方面是因为城镇边界本身是难以界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城市在性质、功能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就世界范围而言,对于确定哪里是城镇哪里是农村并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各国确定城镇的标准有很大的差异,包括人口数量(在加拿大为超过 1000 人,在肯尼亚为 2000 人,约丹为 10000 人,而日本为 50000 人)、住宅的密集程度、公共服务的种类和水平、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比例以及官方指定等。^② 而且我们知道,当农村地区达到了所规定的标准的时候就会重新被界定为城镇,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却可能没有任何改变。

城镇的规模有巨大的差异,大都市的人口可能超过 1000 万,而小城镇的人口可能只有几万甚至几千。在发展中国家只有 1/3 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人

^① Ellen Wratten, "Conceptualizing urban poverty",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Vol. 7, No. 1, pp. 11—33.

^② UNCHS(Habitat)(1987),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 198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and New York.

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①而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2000年中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仅占城镇数量的6%。^②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偏僻的小城镇的居民与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居民之间的差异要比这个小城镇与其周围农村之间的差异要大很多。而上海与其周围的广大的农村地区之间的分界线又在什么地方呢?

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把城乡的区分看成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要比生硬的二分法更为恰当。首先,人类的居住地很明显包括一个很大的范围,根本不可能轻易地分成两类。任何一刀切的分类方法都是武断的。而且,城市、小城镇以及农村之间在功能上是有联系的,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待某一个地方所出现的问题。城乡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联系广泛地存在于许多领域,包括城乡人口迁移以及人口增长,季节性的劳动力流动,商品和服务的市场,水的供给与需求,教育、医疗及娱乐设施,汇款以及家庭支持网络等。一个人一生可能会往返于城乡之间,而且城乡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安排。对一个部门的某个部分的干预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不仅会影响本部门中的其他部分,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的部门。

其次,更多的关注城镇贫困是否比农村贫困更为严重会使人们忽略影响贫困者生活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土地分配,资产,人力资本,基于年龄、性别、种族以及残疾人士的制度性机会约束,政府的社会政策以及宏微观经济政策,饥荒及战争等外部冲击,决定汇率、贸易条件以及经济制裁的外部关系,债务偿还以及其他国内的经济政策等。这些影响贫困的基本因素中有很多是无法仅通过城市层面的干预能够解决的。

第三,承认城市人口生存机会的多样化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区别城市中不同的人群来分析和解释贫困。一旦我们把城市当成是由相互联系但又各不相同的社区构成的进行研究之后,城乡二元的分类就会变得不再那么合适了。把贫困按照市中心、郊区及周边地区进行空间分类或者按照居住时间、家庭类型、社会阶层、种族、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类可能

① Hardoy, Jorge E, Diana Mitlin and David Satterthwaite (1992),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ird World Cities", Earthscan, London, p. 31.

②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

更为有用。^①

1.2.2 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的差异

尽管把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区别开来确实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就整体而言,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确实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特别是城镇贫困人口面临的一些特殊风险和困难是农村人口所没有的。

第一,城市人口面临着特殊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城市具有工业生产和居住的双重功能,正是这两种功能的并列引起一些特殊的环境问题和健康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较高的人口密度以及过于拥挤的居住;清洁饮水的供应、污水及垃圾处理服务扩张的速度与城市增长的速度不相适应;交通拥挤的风险以及无法有效控制污染及事故的发生等。

城市的发展是出于把企业集中到一个成本上有效率的空間结构中的需要。^②而人们来到城市生活主要是由于城市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但是,城市工业生产的外部性更多地由城镇贫困人口来承担。廉价的住房以及重工业设施一般都位于城市中土地价格比较低的地区,如果没有有效的规划控制,很容易造成廉价的住房与重工业生产基地邻近,这种邻近会带来特殊的环境问题。曾使全世界震惊的印度博帕尔惨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惨难导致 3000 人死亡、10 万人严重受伤以及 20 万人被迫撤离,如果导致惨剧的工厂位于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或者非居住规划区中,那么这一灾难就不会影响到这么多人。

这种风险不仅是规划的问题,而且也是低收入人口的理性选择。因为对于收入很低的人来说,居住在靠近经济机会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而正是这些地方可能存在环境及健康风险。这些风险会极大地提高贫困者的脆弱性,因为不测的灾难可能会使他们失去住房、财产、收入来源,而被迫搬迁还会使他们失去以前的社会联系。^③

据 Hardoy、Cairncross 以及 Satterthwaite(1992)等人的估计,在第三世界

① Ellen Wratten, "Conceptualizing urban poverty",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Vol. 7, No. 1, pp. 11—33.

② Harvey, David(1975),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Edward Arnold, London.

③ Hardoy, Jorge E, Diana Mitlin and David Satterthwaite(1992),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ird World Cities", Earthscan, London, p. 31.

国家中,有6亿城市居民居住在有健康和生命危害的房屋和地区。^① 这些危险包括污染的水源和食物而引起的伤寒、严重的腹泻疾病、霍乱、肠道感染;与污水处理和垃圾回收有关的疾病如疟疾;与过度拥挤、住房条件太差以及供水不足而引起的病菌感染;与过度拥挤和通风不佳有关的疾病如肺结核、脑膜炎、流感等;与通风和明火有关的影响儿童发育的血液铅含量过高;滑坡、洪水以及地震会给边缘地区带来损失;儿童因无场地玩耍而引起的烧伤及其他伤害;过度拥挤的社区给残疾人士带来的行动不便。^②

第二,因商业交换给城市人口所带来的脆弱性。总的来说,与农村相比,城市的生活更为商业化。因为生产更趋于专业化,人们依靠市场交换得到基本的商品和服务,也依靠交换来获取收入。

很明显在城市不存在自给自足的生产(农业),几乎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要通过交换而获得。尽管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商品化也是农村地区的一种发展趋势,不过,商业交换在城市地区会更为普遍存在。曼根(Mangen, 1993)在研究欧洲市中心贫困时发现商业交换会影响城镇贫困的三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即当地经济、住房和教育。^③

城市家庭需要用货币来购买水、食物以及住房等基本需要的物品,而这些东西在农村可能会是免费的(至少要便宜得多),城市家庭还需要购买一些农村可能没有但是在城市中普遍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这大大增加了城市家庭获取货币收入的压力。如同无地农民一样,城镇贫困人口能够换取收入的主要资产就是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但是供他们选择的工作机会却由于缺少正式的受教育背景而受到了限制。由于工作机会有限,在城市中的就业“通常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对某个雇主的全面依赖关系的结果,而这个雇主还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④

① Hardoy, Jorge E, Sandy Cairncross and David Satterthwaite (editors) (1990), "The Poor Die Young: Housing and Health in Third World Cities", Earthscan, London.

② Harpham, Lusty and Vaughan (1988); also Surjadi, Charles (1993), "Respiratory diseases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mong households in Jakarta",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Vol. 5, No. 2, pp. 78—86.

③ Mangen, Steen (1993), "Marginalization and inner-city Europe", Cross-National Research Papers, 2nd series, No. 7 "Dualistic Europe", p. 60.

④ Pryer, Jane and Nigel Crook (1988), "Cities of Hunger: Urban Malnutri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am, Oxford.